

中国邮政开办 120 周年(中)

◆ 李崇寒

1923年挤兑风潮唯邮储能如数提款

邮政储金汇业总局的成立，是这一时期中华邮政的另一大发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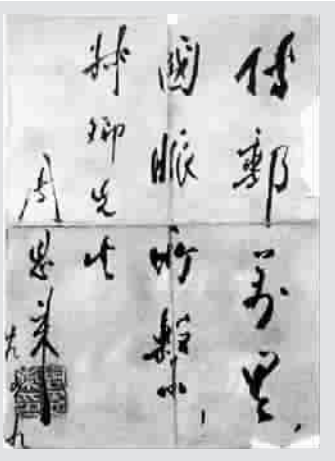
邮政储金业务筹备于清末，1919年7月由中华邮政正式开办。先在北京、天津、上海等11个大城市开办，年底发展到81个通都大邑。名义上，办理邮政储金的机构为邮政储金总局，但它与邮局仍为一个系统，名分实不分。邮政储金的经营方针是：“人嫌细微，我宁繁琐；不争大利，但求稳妥。”中华邮政开办邮政储金主要吸收教职人员的小额存款，满1元即可开户，到1929年，存款已达1080万元，加上上年结存共有1813万元之巨。

邮政对这笔存款大部分运用于最优生息事业，利率虽低但稳定可靠，信用较高。1923年北京普通银行发生挤兑风潮，唯独邮政储金能如数提款，信誉大增。1929年，新任的邮政总局总办刘书蕃在参加伦敦万国邮政联盟会议后，赴欧、美、日等地考察邮政和储金方面的各项制度和经验。回国后，其职位被汪精卫改组派和政学系支持的代理邮政局长林实取代。刘书蕃据欧美等国邮政发展经验，借口发展储金汇兑必须有专管机构，建议将邮政储金和汇兑业务从邮政总局划分出来，另设总局来管理。

交通部部长王伯群支持刘书蕃，并把他的建议呈报行政院，很快得到批准。1930年3月15日，邮政储金汇业总局在上海成立，以后又在上海、南京、汉口等地开设储汇分局。除办理中华邮政的邮政储金、汇兑、保险（后改称保价油价及包裹）、代收货价等业务外，还大量经营买卖股票、抵押放款等银行业务，成为名副其实的金融机构，与“邮政银行”无异。1942年，邮政储金汇业局纳入国民政府“四行两局”（即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中国农民银行、中央信托局、邮政储金汇业局），成为官僚资本金融垄断体系的一个组



▲ 上海邮政储金局办公场所
► 周恩来为国民党第三军邮视察段总视察林卓午题词“传邮万里，国脉所系”



成部分。

1937年12月，南京沦陷，邮政总局随国民政府内迁，沦陷区邮政业务与邮政总局失去联系，邮政业务发展艰难，包裹业务极度萎缩。抗战胜利后，邮政总局迁回南京，虽锐意革新、兴利除弊，出现了短暂繁荣，但内战全面爆发后，邮政业务大受影响。国民党退居台湾后，大陆建立起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宗旨的人民邮政事业。

人民邮政的前身——赤色邮政

人民邮政的前身是中共在地下工作时期建立的党内交通，在革命根据地创建和巩固的情况下，人民邮政才得以公开，首先产生的是赤色邮政，即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开辟红色根据地初期的通信组织形式。

1931年9月，红军取得第三次反“围剿”胜利后，革命根据地日趋巩固，11月，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在瑞金叶坪成立。为适应日益增多的邮政通信需要，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邮政总局于1932年5月建立，自行印制和

发行邮票。苏区全盛时期，中央邮政总局下辖6个省局、95个县局，邮政人员仅江西、福建、闽赣、粤赣四地就有4700余人。

苏维埃邮政成立后，为配合反“围剿”的斗争需要，创设了特别快信服务。“特别快信投交邮局后，保证随到随送，昼夜兼程，……递信员传送快信时全凭一副铁脚板，一昼夜可跑180里”，他们通常将“特别快信递信员要为一日一夜超过180里路而斗争”列为局际竞赛目标。这种业务特别适用于没有无线电或电话的部队，当省军区、独立师与军委联系时，经常会使用特别快信业务。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又在陕北省交通站的基础上，按照苏维埃邮政的规章制度，创立了陕北苏维埃邮政，发行邮票，实行有资寄递。因赤色邮政与中华邮政分属两个对立政权，所以赤色邮政只能在中央苏区和其他苏区间传递邮件。为了方便辖区百姓，苏区各级邮局还代售中华邮政邮票，代收国统区寄来的邮件。

抗日战争爆发后，人民邮政在广大敌后

遍地开花。山东是根据地内最早实现邮政、交通、发行三位一体的地区。1941年10月，为了加强抗战时期的交通和党报发行工作，中共山东分局、山东战时工作推进委员会、山东军区和《大众日报》社联合组成了山东战时邮政推进委员会，决定将各自设立的交通、通信系统合一。隔年2月，颁布了建立战时邮局的决定，邮局接办党报发行，实行邮发合一。

山东战邮从建立开始就把主要力量用在交通线上，至1944年上半年，山东战邮已建立交通线达1.7万余华里，广大战邮工人穿行在敌人的碉堡群中，战胜重重封锁，传送着党的文件、报刊和信件。对敌占区的党报发行工作，山东战邮做出了出色成绩，战邮职工们千方百计把党报送到敌占区，方法多种多样，如：通过中华邮政或社会团体往敌占区寄送；通过小商小贩往敌占区带送；在敌占区组织秘密发行网，有选择争取订户；或是由战邮职工或武工队去敌占区张贴或散发党报等，弄得敌人草木皆兵。

国共通邮艰难历程

国共通邮一贯是中国共产党的主张，抗日战争期间，国共实现了第二次合作，尽管在通邮方面仍有不少阻力，但双方合作意向明显，取得了一定的效果。当时负责晋陕甘宁等省军邮事务的中华邮政资深人员林卓午以第三军邮视察段总视察的身份在西安工作，有机会接触到周恩来与林伯渠。

1940年上半年，周恩来向林卓午表达了沟通国共双方管辖地区信件往来、使人民有通信自由的愿望，并为其题词：“传邮万里，国脉所系。”对中国共产党政策有了进一步了解的林卓午决心为国共通邮做出努力。1941年5月，晋察冀边区军邮视察员冯玉松返回西安途中，于延安与陕甘宁边区负责人会见，回到西安后，林卓午安排他给中华邮政邮局人员做报告，介绍了八路军对邮政的保护，如在护送他们过同蒲铁路时付出的血的代价等。

金石铁笔仁者寿——高式熊传

潘真



22.见证了它的前世今生

黄家的人，至今还觉得自家在“文革”中幸免于难确实很幸运。因为在这条弄堂里，除了黄家，几乎每家都被抄过了。而这条弄堂里的房子，原本都是两层楼的，只有黄家加了一层，因为当年有地下党亲戚夫妻要借重艺术家青山衣的掩护，以便于开展活动，地下党支部出资加盖了三层的房子。所以，黄家的三楼鹤立鸡群，在三楼房间里说话，邻居是听不到的。“文革”中，虹口区一批“牛鬼蛇神”中学校长组织起来，也喜欢在这里聚会。

黄葆戉在1968年7月病逝。1997年8月，其骨灰才得以安葬于上海福寿园。他的墓志铭，由郑逸梅撰文，高式熊书写，吴天祥镌刻。

东方红书画社这个名字，明显带有时代特征。高式熊几乎见证了它的前世今生——“三十年前的上海，一个有月亮的晚上。我们也许没赶上看到三十年前的月亮。年轻人想着三十年前的月亮该是铜钱大的一个红黄湿晕，像朵云轩信箋上落了一滴泪珠……”这是张爱玲写于1943年的小说《金锁记》的开头，现在成了名句。

“朵云轩信箋上落了一滴泪珠”这一意象中，最美的是“朵云轩”三个字。朵云轩在上海，是创建于1900年的一家文房四宝店。当年，张爱玲曾在那里定做做过信箋。上海的朵云轩与北京的荣宝斋，一南一北，有着深厚的传统文化积淀，在中国艺术品市场中举足轻重。朵云轩以中国书画及与其相关的宣纸、湖笔、徽墨、歙砚等文房用品的经营和巧夺天工的水版印刷复制艺术著称。

1960年，由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的木刻水印室和荣宝斋上海分店等十数家书画老店合并，并从北京荣宝斋调来若干专业人员，成立了具有民族文化传统特色的书画出版和书画经营的专业出版单位——上海书画出版社，又名朵云轩。或者更确切地说，朵云轩的编辑部就是上海书画出版社。

朵云轩在艺坛有“江南艺苑”“书画之家”

的美誉。传说中，很久很久以前，朵云轩老店主与倪墨耕、王一亭、赵子云等海上名家都是至交，谈论艺事之余，还常一起吟诗作画，拍曲弹唱。上世纪20年代，张大千初到上海，能拜在曾熙门下学习书艺，还是朵云轩牵线搭桥的。60年代初，在朵云轩宽敞幽静的营业大厅正中，摆着红木台子和椅子，书画家是这里的座上客。林风眠与资深营业员促膝交谈、翁闾运为读者讲授书艺的场景，不足为奇。

朵云轩的一大主业，是中国原作字画的征集、收藏与经营。1960年重建以来，它从民间征集的书画文物数以万计，提供给文博单位的珍贵藏品也有数百件之众。有一次，中国历史博物馆南下觅宝，在朵云轩相中《宋拓王羲之圣教序》，这部名帖比民国徐世昌收藏的《墨皇本圣教序》更珍贵，成为该馆十件镇馆藏品之一。这部名帖是怎样重生的呢？张家花园的一位居民请朵云轩派员上门征集，朵云轩鉴定员翻检其前人留下的一大堆旧碑帖，从纸堆里掉下两张残片，鉴定员捡起一看，即断定为宋代拓片，遂发动这家人翻箱倒柜，经过几天搜寻，终于从尘封的壁角里抢救出这部稀世名帖。此外，朵云轩自身收藏宏富，上世纪80年代中期，由谢稚柳先生任组长，徐邦达、杨仁恺、刘九庵等组成的专家组全面鉴定朵云轩藏品，给予高度评价。

“文化大革命”期间，“朵云轩”的店招被“东方红书画社”覆盖。1972年，又改名为“上海书画社”。1978年1月，恢复原建制，并改回原名，同时保留兼用“朵云轩”原名。

改名为“上海书画社”次年，高式熊就与出版社发生关系了。这是自然而然的，他是篆刻家、书法家嘛。

1973年，东方红书画社组织了高式熊与方去疾、单晓天、叶璐洲、潘德熙、韩天衡、童衍方、刘一闻和顾振乐等10余位篆刻家，选刻毛泽东诗词和“样板戏”台词。

篆刻家们以简化字入印，集体创作、出版《新印谱》。那时候，图书出得很少，印谱更是极少出版，《新印谱》甫一面世，书法篆刻爱好者奔走相告、求之若渴。两年里出了好几辑的《新印谱》，影响从上海波及全国，给传统的篆刻艺术带来了复苏的希望。

17.复杂多元的心绪

周仪也有一首赠给龚自珍的诗写于船上，此船与彼船，是否同一时间，同一条船？是乘渡船，还是游船？相关史料上未做说明。周仪与龚自珍在船上，因了解到龚自珍“好谈释典，近欲著蒙古八表，舟中枯坐，赠诗一章”：“波云谲诡神功，健笔摹霄孰与同？西北壮游谈穆满，方州奇字析杨雄。言空八部天龙界，手溯诸番水草风。他日书成扁石室，可容津逮万山中。”此诗主体内容是对龚自珍致力于研究西北边塞治理问题大加赞赏。

在经过周仪家时，龚自珍居其盟鸥馆，并为其馆撰写楹联，可见这一路同行结下多么深厚的友情。虽然与宋翔凤去京时也是一路同行，但却未留下多少两人唱和的文字，而在返还与周仪同行途中，却几乎吟吟不断。龚自珍因此而留下诸多千古传诵的文字。盖因都是同行，来去心情两重天也。去时两人（龚与宋）的心情必是踌躇满志，虽前景叵测，但毕竟心存希冀；而返时遭受落败打击，两人（龚与周）心情必定沮丧沉郁，故而有更多感慨化为诗篇，从心中涓涓流出。

这篇周仪四十三岁，龚自珍二十九岁。如果说，龚自珍还有继续入仕的欲望，那么对于周仪来说，这次会考后通常不会再长途跋涉地去钻那个鸽子笼似的考场经受了煎熬了。古人有言：四十未入仕，不再为仕。即一个人如果年到四十岁以上，还未能在官场发迹，那就应该理智地放弃了。

在扬州又与宋翔凤相逢，只知道龚自珍曾在扬州写过和宋翔凤的侧艳诗，但此诗在全集中未见，是散佚，还是龚自珍在编诗集时未收入，不得而知。在龚自珍离开扬州时，宋翔凤有诗赠行：“逢君低首觉无端，别最凄凉最最难。豪气莫居楼百尺，俗情大有路千盘。几教送客青衫湿，愁取佳人锦瑟弹。珍重华灯照尊酒，渡江此水正漫漫。”

此诗缠绵悱恻，充满悲情。失意人送失意人，此番酸楚失落的况味也只有当事者能够体会到。但读此诗，几乎也要让笔者为之而“青衫湿”，在强忍泪水时，又有一种后人为之感受到的苍凉感。戏外人看戏内人，总

还是有一种因距离而产生的悲怆。这种感觉，只有入乎其内，才能体验到；又必须出乎其外，才能看得更清晰。

龚自珍的心情无疑是非常纠缠而复杂的心绪。剑气箫心，这两种兼具刚和柔的心绪在他胸中不停地回环。出与入，进与退，这道人间永恒的哲学难题，在不断揉搓着他的灵魂。

从同是写于这一年的诗《观心》《戒诗五章》《呜呜》《咏史》等诸多重要诗作中，可以看到作者复杂多元的心绪，既有愤世嫉俗，对现实社会的激烈批判，又有要“戒诗”——彻底告别诗词写作这类于事业功名无助的习性的非常之举；既有像外祖父段玉裁曾嘱咐的那样，专攻经史之学，努力做大儒、名臣的不甘，还有希冀过一种“美人经卷葬年华”的生活，彻底从功名中解脱的出世之想。总之，龚自珍的心情此时如在阴雨天气中恹恹欲睡的李清照女士那样——“最难将息”。常常说“国家不幸诗家幸”，此言可否改为“诗人不幸诗家幸”？

且看先生部分诗篇。在《观心》中写道：“结习真难先，观心屏见闻。烧香僧出定，譚梦鬼论文。幽绪不可食，新诗如乱云。鲁阳戈纵挽，万虑亦纷纷。”

“结习”乃佛家语，意为世俗习惯、情感等，这里指作者的“济世之志”。佛经有故事说，天女以天花散诸菩萨、大弟子身上，花至诸菩萨，皆纷纷坠落，唯落至大弟子身上，花便不坠了。天女曰：“结习未尽，花着身尔；结习尽者，花不着身也。”龚自珍称自己结习难尽，可见其并未能做到六根清净。想清静也难啊！你看，刚刚效法僧人烧完了香，内心获得些许禅定，偏偏那些“恶人”们又闯进自己的梦境，议论自己写的那些文章。内心那些忧国忧民的幽深的思想情感无法消逝（“食”，蚀，消失），待写的新诗纷纷涌上心头。鲁阳公纵可挽戈返日，万千思虑却难以泯灭。（“鲁阳公”掌故出自《淮南子·览冥训》：“鲁阳公与韩构难，战酣日暮，援戈而挥之，日为之反三舍。”）先生的矛盾心境，在诗中表露无遗。

剑魂箫韵

龚自珍传

陈歆耕

